

高等教育新论

——多学科的研究

王承绪主编

王承绪 徐 辉 郑继伟 编译
张维平 张民选

G-AODENG JIAO YUXIN LUN

GAODENG JIAO YU XIN LUN

王承绪主编

外国高等教育丛书

高等教育新论

——多学科的研究

王承绪 徐辉 郑继伟 编译
张维平 张民选

浙江教育出版社

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Eight Disciplinary and Comparative Views
Edited By Burton R. CLA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高等教育新论
外国高等教育丛书

王承绪 主编
王承绪 徐 辉 张民选
郑继伟 张维平 编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插页2 字数233000 印数00001—5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8-0456-2/G·457 定价: 2.70元

《高等教育新论》中文版序

伯顿·克拉克

本书以1982年夏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的论文为基础加以撰写，于1984年春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以来，在欧美广为传诵。其读者包括瑞典、挪威、芬兰、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的学者、学生和感兴趣的行政官员。它所受到的欢迎和它的明显的用处，对本书中心部分各章的作者和负责导言及结论两章并统编全书的我来说是非常愉快的。

本书中文版的问世使我们深感喜悦。它使很多以中文为母语的广大专家学者注意到我们的工作，从而使本书为更广大的读者所使用。中文版也标志着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加入高等教育的跨国分析的行列。

因此，我对王承绪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为准备本书中文版付出的巨大努力非常感激。英译工作无疑总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当使用专门的学术概念时，翻译工作一定倍增困难。本书八种不同观点，各有其专门的术语，必须战而胜之，还要使译文明白易懂。我愿代表珀金、威廉斯、柯根、屈罗、比彻、施瓦茨曼、塞里奇和我自己，对所有在把本书译成中文的工作中贡献力量的人表示感谢。

我还想再强调一下在本书导言和结论两章中所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各门社会科学及其主要的专业所展开的广泛的观

点，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高等教育的基本工具，不管这个学科是历史学、经济学或政治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都给我们提供了观察世界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高等教育部门。每一观点有它独特的优点，也各有其缺点。我们需要了解那些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利用这些优点，我们可以发展一系列的研究方法。意识到这些缺点，我们可以避免每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的“井蛙之见”和缺乏辨别力。教育家们可以在这些观点中自行转换，利用不同的观点解决不同的问题，或进行不同的争论。他们可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无论什么方式把这些观点结合起来，丰富他们自己的见识，提高他们对可能不被注意的微小差别的敏感性。

也许高等教育研究方面有一个重要而且微妙的问题在本书中强调得不够，这就是在国家学术系统中如何作出决策和如何进行控制的问题。权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包括集权和分权的各种形式，专业的（教授的）权力和各种官僚与政治的控制形式的结合，个人监督和学院集体决策等等。现在大家都懂得，大学和高等教育系统有着广泛多样的目的和模式的程序。研究工作本身是一项极其开放的活动，难于事先作出判断，也难于进行整理。因此，在一个有效的系统中，控制一定是异常松散的、多方面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在高等教育的跨国研究中，我们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探索和更好地了解那些指导行政人员、教师和学生们的活动的实际决策模式和控制模式。这个任务，值得最有才能的人去艰苦努力；要完成这个任务，无疑需要应用本书所提出的各种学科的观点。

（王承绪译）

译者序

本书原名《高等教育的观点：八个学科的比较的观点》，这是八位国际知名的专家学名的集中研究成果。八位作者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伯顿·克拉克教授为首，代表八个学科的观点，即历史的观点、政治的观点、经济的观点、组织的观点、文化的观点、社会学的地位的观点、科学社会学的观点和政策的分析的观点。他们又都具有若干国家的高等教育实际工作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本书可以说是一本有关比较高等教育方法论的专著，为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子。伯顿·克拉克教授便是比较高等教育这一研究新构想的总代表。本书以《高等教育新论》命名就是为了体现这个新的构想。

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八百年来高教改革最广泛开展的时期。随着高教事业的迅猛发展，高教研究工作也蓬勃展开，扩张、试验成为高教研究的主题。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由于经济衰退和出生率下降等原因，西方高等教育陷入“退却”、“紧缩”和“衰落”的阶段，高教研究转向回顾过去，崇尚传统。很多人对高等教育的前途深感忧虑。专家们预言，十年以后西方高等教育将出现复兴，需要对高等教育进行深入的、多学科的、跨国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

克拉克教授提出这个多学科、跨国家研究高等教育的新构想。

高等教育事业是全社会关心的事业，又是极其复杂的事业。高教研究工作，不仅从事教育的人要参加，还需要从事其他专业的人参加。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既要看到高教的各个局部，又要看到高教的整体；既要看到树木，又要看到森林。因此，在集体研究的组织形式上出现了新的格局：八位专家各摆自己的观点，联系高教实际，提出专题报告；邀请撰稿人和其他专家举行研讨会；主编根据研讨会结果撰写导言和结论而成立专著。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新的突破：采用社会科学方面的观点，取代通常的问卷、访问、历史文献分析、实验室实验以及统计分析等研究技术。

本书介绍的八个观点，除了比较常用的历史的观点和经济的观点以外，其余六个观点多数只是最近才运用于高等教育的研究，其中组织的观点、政治的观点和社会学的观点，近年来取得了研究成果。对于这八个观点，克拉克教授在导言中作了扼要的介绍，提出了每个观念的中心思想。本书第一章至第八章是八位专家的专题报告。第九章结论，把八个观点联系起来，归纳为四个方面：政治与市场；机构与文化；科学与高等教育；在高教政策和管理上的运用。

本书提出的研究高等教育新构想，采取多学科的观点和比较的观点研究高等教育，有助于我们扩大对高等教育的视野，提高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可以从中汲取对我国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有益的经验。这不仅反映在研究方法方面，尤其反映在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方面。具体地说，现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同志，除教育专业以外，应加学一、二门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社会学和组织理论。目前在教育经济学方面已建立了学科分支和学会，教育社会学尚待发展和筹

建，组织理论如何应用于高教研究，仍属空白，我们将在本丛书陆续介绍。另外一方面，希望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同志愿意同时从事高教的研究，充实和壮大高教研究的队伍。本书的编译，目的当然首先在于介绍国外高教研究的方法，如果能对我国高教研究队伍在知识结构上有所变化，从而加强我国的高教研究工作，那就是编译者的期望了。

克拉克教授对本书中文版的编译工作非常支持和关心，并为中文版写序，借此机会我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王承绪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目 录

(I)	《高等教育新论》中文版序	(伯顿·克拉克)
(II)	译者序	(王承绪)
(1)	导 言	(伯顿·克拉克)
(21)	第一章 历史的观点	(哈罗德·珀金)
(58)	第二章 政治的观点	(莫里斯·柯根)
(84)	第三章 经济的观点	(加雷斯·威廉斯)
(117)	第四章 组织的观点	(伯顿·克拉克)
(146)	第五章 地位的分析	(马丁·A·屈罗)
(187)	第六章 文化的观点	(托尼·比彻)
(226)	第七章 大学的科学活动	(西蒙·施瓦茨曼)
(265)	第八章 政策的观点	(拉迪斯拉夫·塞里奇)
(292)	第九章 结论	(伯顿·克拉克)
(314)	后记	

导 言

伯顿·克拉克

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比二十五年前提高多了。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已呈几何级数增加，在行进中的知识前面奔驰。这种令人困惑的差距有许多来源。在近代社会的许多有组织的部门，各项任务急剧增加，各种职责日益模糊。许多观察家和分析家都惊异地谈论着事务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确定。在高等教育的内部，学术研究的紧迫号令，在旧的知识领域内部迅猛地创造出新的知识领域和神秘的学术专业，使国际学术中心的许多名牌大学和学院的基础不断分化，然后向下扩散到自己国家的其他大学和学院，向外扩散到其他国家。仅仅基于这些原因，如果我们要领会学者们在做些什么，每年就有很多东西要了解。近代高等教育规模的迅猛扩张，更加增加了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高等教育规模和范围的变化，以学生和教授人数的增长为标准，反映在行政梯队的层层叠加，上层的人和下层的人，内部的人和外部的人越来越感到彼此没有联系，就是证明。同时，很多人增强了对了解和控制高等教育的雄心壮志。公民、官员和实际工作者都怀着日益高涨的期望，认为我们应能安排教育事务，控制教育改革。分析家们深信，他们应该找出答案，并且认为如果他们加倍努力，设计正确理论，将能做到这一点。在使我们迷惘的模糊之中应该发现简明的线索。而同时，差距又在扩大。

怎么办？没有方法放慢不断增长的复杂性，因为经验的世界任何个人无法控制。在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在各国之间，科学和高等教育内部在发明、专门化和竞争等方面出现的出乎意料的事就足以保证将来不会更加简单。从分析的方面看，研究工作者不大可能积聚大量的资源和人力极大地加速他们的进展和拓宽他们的研究范围，从而弥合差距。象在别处一样，他们的命途多舛。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有选择地进行研究，和压低他们的期望。我们从来没有真正需要了解高等教育的一切，那些想全部弄清近代高等教育系统的人们，是想做不可能的事，把注意力推向错误的方向。战略的决策是要有选择，更加有意识地区分重要的和琐细的。

在有选择地探索高等教育的复杂现实的过程中，在当前，求助于若干最有关系的学科和它们所提出与运用的一些观点，有很大好处。多种不同的分析的专业便是一些可供选择的认识方法，是使分析家更有知识同时又更加无知的视力通道。一个有启发作用的观点就象戏院里的聚光灯，当用强烈光线照射舞台前方的某些动作时就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动作上，同时把其他特征降到背景和边缘的地位。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所有灯光都照射，眼睛往整个舞台前后漫游。但是学科的观点是非用不可的，因为我们正是在专家所发展的研究方法和思想的力量中找到利刃。高等教育的研究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手边没有进行这种研究的各种不同的分析观点，没有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组织理论等所提供的观察的方法，我们将不得不发明它们。

随着过去二十年间高等教育研究的加速发展，我们确实看到了许多学科的专家们的工作。社会学家们对高校入学机会和质量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经济学家们致力于人力资本

理论和大学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政策分析家们已经离析出决策的主要领域，既研究政策的制订，又研究政策的实施。历史学家们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事件的川流不息和过去怎样制约着现在。当专家们研究出这些问题时，很自然他们只管自己的事，不同学科的奖赏保证学术活动将沿着不同的轨道奋进。专家们有各种不同的词汇，难于了解彼此的语言。当他或她正专心致志研究本门学科时，谁能理解计量经济学家呢？学科专家们占领不同的文化机构，在不同的刊物发表文章，参加不同的会议，属于不同的学术团体。同时，因为他们谈论很不相同的东西，各自有一定的自信心，他们既迷惑实际工作者和外行人，也互不了解。

因此，当学科专家们研究高等教育时，我们可以跟随他们，要求他们解释他们的聚光灯所揭露的东西，并给他们相互介绍，这是有意义的事。偶然的集体研究也可能是很有效益的。这种努力可以加强一种意识，就是那些分裂知识的人有责任把知识整合起来。它们可以通过其他领域的专家的坚持在树丛中多看一下森林并且帮助各个领域的专家开阔思想。它们可以提供同声翻译，把专家的行话变为共同分享的语言。它们还能通过任何一门专家更多地了解相邻专业的专家们的研究成果而丰富本专业的内容。由于在集体研究中一个人的见解的局限性和别人见解的价值的同时发现，它们甚至能减少专家们的骄傲自大，提高学术工作中谦虚谨慎的作风。经过一番特殊的努力，集体研究还能对松散联合的研究中所出现的混乱现象提供一定程度的概念和分析方面的条理性，不是严密地控制研究，而是建议研究什么最有前途。这种集体研究，通过妥善的报导及不同专家的汇集，有助于博学之士了解各专业的特殊贡献，融会贯通，促进更为广泛深入的理解。

这些就是本书作者的希望和目的。主要的八章的构想就是要阐明八个观点：历史的观点，政治的观点，经济的观点，组织的观点，社会学的地位观点，文化的观点，科学的观点，和以政策为中心的观点。我们要求专家们通过他们学科领域的透镜观察高等教育，说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各个观点注意高等教育系统的什么方面？什么是一个观点所想象或看到的，而其他观点所不会考虑或强调的？把高等教育看作一个政治系统，一个经济系统或者一个科学系统是什么意思呢？一个观点怎样和指导其他领域分析的研究方法联系起来呢？非历史学家的观点能千方百计解决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问题，还是他必须基本上保持与历史无关呢？有没有可以辨别的重迭部分或差距呢？

第一章至第八章这八篇文章开始是这样计划的，让八位学者各摆自己的观点，各取自己的方式。但是，他们也对一些共同的课题，邻近的解释，和对别人有助益和使他们感到舒服的研究方法，寻求某种统一的认识。1982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的夏季学术讨论会上，①经过四天的热烈讨论，二十五

①“高等教育系统：八个学科的和比较的观点”讨论会，于1977年7月26日至31日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出席的25位专家除本书作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和社会学教授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哈罗德·珀金（Harold J. Perkin）教授、英国布鲁纳尔大学政治系主任莫里斯·柯根（Maurice Kogan）教授、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加雷斯·威廉斯（Gareth Williams）教授、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马丁·屈罗（Martin A. Trow）教授、英国苏萨克斯大学教育系主任托尼·比彻（Tony Becher）教授、巴西利亚热内卢大学研究所西蒙·施瓦茨曼（Simon Schwartzman）教授和巴黎第九大学教育和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拉迪斯拉夫·塞里奇（Ladislav Cerych）博士八人外，尚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鲍德里奇·J（Victor Baldridge）博士、柯尔曼（James S. Coleman）

位专家批判地评价了八篇文章。这二十五位专家都凭学科专长和比较研究的经验选聘，以保证对有关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然后对每篇文章进行修改，编辑成书。

第一章至第八章主要不是理论的系统阐述，或者方法论的运用，也不是文献的评述。确切地说，我们要求每位作者突出各自学科领域中在广义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方面的长处，进而以较大篇幅说明已经掌握的材料。某一特定的研究方法对理解高等教育提供了什么优秀的学术成就？此外，每位作者可以任意发挥各自特有的分析兴趣和优势。高等教育的研究既是一个散开的研究领域，又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每一个航行者在探索解释的道路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个课题是一个“软”课题，在这个领域中，个人的风格和解释将继续起重要作用。所以，各章的意见既表达八个学科的观点，也是八位专家的个人的意见。

八位作者是以其跨国经验受到邀请的，我们要求作者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搜集材料，尽可能充分地进行比较的分析。在探索若干高等教育系统的工作时，一个公认的观点最能从叙述所示的材料中表明它的价值。如果一个比较新的观点很

教授，罗蒂斯 (Gary Rhoades) 博士和苏洛蒙 (Lewis Solomon) 教授，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罗斯布拉特 (Sheldon Rothblatt) 教授，耶鲁大学的盖格 (Roger Geiger) 博士，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阿尔特巴赫 (Philip Altbach) 教授，阿姆赫斯特马萨诸塞大学的伯恩 (Barbara Burn) 博士，马里兰大学的伯达尔 (Robert Berdahl) 教授，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布莱克斯东 (Tessa Black Stone) 教授，兰开斯特大学的富尔顿 (Oliver Fulton) 博士，巴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弗恩 (Dorotea Furth) 博士，西柏林自由大学的胡夫纳 (Klaus Huefner) 教授，卡塞尔综合大学的泰希勒 Ulrich Teich 教授，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普雷姆福斯 (Rune Premfors) 博士和威特洛克 (Bjorn Wittrock) 博士，以及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潮木守一教授。

少研究可以引用，那么它就指出当进行更多的研究时，可以明确什么问题。无论旧的或新的研究方法，对教育制度这种客观现象，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已成为寻求共同特征和经常发生的模式和同时离析独特性的广泛运用的方法。高等教育的研究需要利用最大可能范围有关共同性和多样性的资料。所以，跨国研究在我们采用的所有观点都是有用的。同时，著名的专家们使用的知识只是逐步地扩展到各大洲。以下各章主要反映对发达的工业国家的高等教育的专门知识，它们只是稍微注意了一下发展中国家，并只是偶尔评论共产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

这八章合起来也是提高比较高等教育讨论的标准的一次努力。过去二十年来，在系统地探索不同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的现实方面有过一些进展。但是这种分析，相对来说比较新，在各大大学缺乏巩固的立足点。忙于其他事情的参加者所作的大量评论远远超过这些分析研究。学者教授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孜孜不倦，严格要求，但往往没有充分准备讨论高等教育，很象忙忙碌碌的医生对医院组织和医学专业状况发表意见。有才能的行政工作者聚会讨论最近发生的问题，解决一些特定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有个哲学家或政治家重申一下高等教育的理想就够了。总之，即使在早期阶段，就有许多观点和材料需要掌握。还需要尽量把描述性、分析性的材料和规范性的材料区分开来，把“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区分开来。

关于“系统”这个比较难懂的名词需要说明一下。系统这个名词有很多用法，意义变化无定，模棱两可，使人感到麻烦，但在任何社会科学中又必须采用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在规模和复杂性很不相同的水平讲高等教育中的系统。例如，课堂的社会系统，大学作为一个系统，一个国家的所有中学后教育看作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本书中系统的用法采用后一种意

义，较小的实体就变成子系统。我们也可以正确变更包括在任何层次的行动者和行动，任意划分边界，规定界内界外。不同观点有不同的切割方法。经济的观点看到的是经济活动，其他活动就在“经济系统”之外。它把人看作经济的行动者，从事资源的分配或货物和服务的交换；当同样的一些人从事其他活动时，他们就在系统以外。甚至当我们集中在一个层次，从一个观点做工作时，在分析中常常要从“系统”的一种用法转变到另一种用法。所以，在用组织观点研究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时，开始时我们可以依靠传统的定义，指大学和学院的集合体和教育部这一类正式的协调工具。所有其他实体和集团都在系统以外，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但是，这就需要扩充边界，把认真从事教育活动的行动者和行动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如学校的董事，立法机关中管高等教育的各种委员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把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机构摆在系统以外。当外界的利益集团在各种有影响的管理委员会担任一定的职务时，例如瑞典，它们显然已经转移到系统以内。因此，即使在一种分析方法以内，“系统”的松散和不同的用法也是可取的。

以下扼要地介绍一下这八个观点，提出一二个中心研究成果，也指出不同观点之间的若干联系。最后在结论一章中研究这八个观点所集中的四个主要问题，即：政治经济学，机构和文化，科学和高等教育，管理政策上的涵义。

历史的观点

历史学家保证我们在探求时间维度，并且把相继的阶段看成是一个阶段通往另一个阶段。历史的研究也就是要提供种种

比较,帮助理解当前:用过去大学的概念来阐明今天大学的概念;早先几个世纪大学的衰弱和复兴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衰弱和明天大学复兴的可能性。关键的问题是:在哪些方面,如果有的话,高等教育总是同样的东西?当变化发生时,它们是直线发展,前进到新的存在形式,还是常常回归旧的形式,重新发明历史的车轮呢?历史的叙述帮助我们触及基础,接触系统的基本特性以及它们的原因和后果。历史成为与变革和稳定有关系的事情,特别是那种不被人承认和未见到的事情。在这点上,历史学家允许自己享有特殊,并常常集中注意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所发生的络绎不绝的事件,别人分别研究的许多因素都在这里汇集。历史学家提供比较全面的叙述,较少有选择的理论作指导,而别人则有意识地强调某一方面或另一方面。

因而,哈罗德·珀金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四个重要阶段的总的看法。在第一阶段,一个独特的机构——西方大学——诞生。从最初的几个世纪产生的同行会一样的价值观念和结构,成为大学长期生存和适应的关键。在第二阶段,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高等教育出现了长期衰落的现象,后来在取代牛津和剑桥等古大学的新院校开始了复兴。这些新的院校如设置自然科学课程的学院,工人讲习所,以及从伦敦大学和达勒姆大学开始,在设置上不同于旧大学的一系列新大学。在第三阶段,我们亲眼目睹19世纪“德国大学的改造”,关键的方法变为单学科教授,他强调高度专门的研究,以研究为基础进行教学。德国的学术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全速发展,德国大学制度长时期内成为公认的国际模式。最后,在当前第四阶段,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法人的官僚机构,完全成为或者非常接近国家的一部分,一般地说,成